

继承与拓展：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逻辑演进与实践路径

魏 丽

摘 要：近代历次科技革命通过革新生产工具推动人的解放进程，智能时代这一逻辑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促使人类活动能力从以智力为主导的“智力人”形态向以创造性为核心的“创造人”形态演进。继承并拓展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智能时代人的解放包含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个性解放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四维向度。智能技术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拓展社会交往空间、激发个性创造力、赋能终身学习，为人的解放提供多元实践路径。本质上，要以制度设计与技术应用协同创新，消解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逻辑，在克服技术异化中，实现人的自由劳动、平等关系、鲜明个性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科技革命；资本逻辑；人的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5)05-0001-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50911.001

21 世纪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正在全面重构人类生产逻辑与存在方式，人类社会据此进入智能时代。这一时代与前智能时代的本质差异在于：智能技术突破了传统技术对人体肢体的单一延伸局限，实现了对人类智力活动的深度介入与替代。这种深刻转型既为人的能力拓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也催生出新型数字化形态。这种异化相较于前智能时代更具隐蔽性与全面性，进而使得智能时代人的解放命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与复杂性，故需回应“在智力被部分替代后如何确证人的主体性”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构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其核心要义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进步的作用下，人们通过不断变革社会制度、扬弃人的异化而达到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最终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 (P300)}。

当前学界对于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相关研究，或聚焦于技术异化的批判维度^[2]，或停留于经典理论的文本阐释^[3]，但在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当代转化与智能时代实践语境的深度融合上存在不足。既有研究虽已论证人工智能通过生产力提升推动劳动解放的机制^[4]，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而获得更多自由时间之后的人该如何实现自由劳动与积极自由。因此，本文着眼于“继承”与“拓展”的理论目标，通过回溯科技革命与人的能力演进的历史逻辑，探索智能时代人的解放内涵与路径，力图在资本批判与技术进步的辩证统一中，为破解智能时代人的发展困境提供理论回应。

一、逻辑溯源：历次科技革命与人的活动能力演进

智能时代人的解放逻辑，根植于科学技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革命性塑造，并在历次科技革命

基金项目：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智能时代人的现代化向度与限度及其启示研究”(GZC20240851)

作者简介：魏丽，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wl_jasmine2014@163.com (北京 100084)

与人的活动能力的互动演进中展开。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5] (P307)}。从技术范式看，近代历次科技革命均以生产工具革新与生产方式升级为核心，推动人的活动形式与能力形态发生演进。从生存方式变革来看，“我们经历了从前现代的血缘关系下的家庭人，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下的经济人，再到今天智能网络环境和算法治理下的数据人的演变过程”^[6]。由此可见，科技革命对人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7] (P2)}。从手工工具、机械工具到智能机器的技术进步，本质上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脑体功能的持续开发——从肢体功能的一般延伸到体能、智能的内外增强^[8]。

（一）蒸汽革命：机械能推广与“机械人”的初步转型

蒸汽革命之前，人类技术主要表现为“工具性技术”——仅模仿人类肢体动作且依赖人力驱动，尚未形成独立动力系统^[9]。这一阶段，人的生存形态可概括为“体力人”，即主要依靠体力进行生产劳动的人。在工具技术时代，个体之间因为天然生物特征不同造成的体能上的差异直接决定人们的生存状态、劳动机会与社会地位，生活目标多围绕体力的保存与强化展开。受限于单一个体能力，人们需以部族、村落为单位开展协作，以共同完成大宗生产任务，因此人们之间的原始相互依赖程度较高，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0] (P52)}。

18世纪60年代，以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标志的蒸汽革命（即第一次工业革命）打破了这一格局。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首次将自然能源（热能）转化为持续动力，开启了机器技术时代。蒸汽机在纺织机械与铁路运输等领域的应用深刻变革了手工生产模式：一方面，蒸汽动力替代人力承担繁重劳动，使人类从高强度体力劳动中部分解放，同时拓展了人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机器大生产催生工厂制度，流水线分工将劳动者固化为重复操作的“机械人”，工人沦为机器“活的附属物”^{[11] (P437)}。所谓“机械人”，意味着人们需要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机械运转，人们成了呆板的、“像机械一样”的人，人的个性受到压抑，劳动异化随之加剧。

综上，蒸汽革命实现了从“体力人”到“机械人”的初步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体力解放与劳动异化相伴而生。自此，人类从工具技术时代迈入了机器技术时代，不得不面临与机器共存的命运，并思考如何应对新技术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劳动能力下降、工匠精神消退等问题。也是从这时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逐渐转向人对机器物的依赖。

（二）电气革命：电力普及与“电力人”的交往拓展

19世纪中后期，电磁理论、X射线和元素周期律等自然科学理论的突破推动了电气革命。从广阔的视野看，电力替代蒸汽动力成为工业生产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粮食”，人类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以电力为驱动，人们创造出了各种新的生产工具，充当人体延伸工具，例如机床是人的手臂的延伸，火车、汽车、轮船是人的腿脚的延伸。电灯、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机等电器产品相继出现，人们获取信息的效率越来越高，人们的活动空间不断拓展，内容也不断丰富，社会交往的便利程度增加。

由此，这一阶段人的存在形态呈现出“电力人”特征，即依赖电力工具认识和改造世界，并借由电力媒介实现知识获取与自身进化。相较于蒸汽时代的“机械人”形态，电气革命之后的“电力人”对以电力为中介的外界事物依赖性增强——电力与电波成为人际联结、人与外部事物之间链接的核心纽带，建立在电力交通与通讯基础上的社会交往活动增多。但同时，对电力的过度依赖也引发新的精神异化：随着电力衍生品越来越多，个体越来越难以脱离电力生存，每个人都成为不断需要充电和蓄电的“电力人”，一旦“断电”便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

随着电力在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中的应用，“电力人”的活动能力和科学文化素质得到了提升，其在改造世界和社会交往活动中的能动性更强。换言之，电气革命本质上通过能源升级拓展

了人的活动范围与交往深度，为后续信息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三）信息革命：知识劳动与“智力人”的能力跃升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引发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信息革命。信息革命以信息的高效传播和高智力要素投入的知识劳动为特征，形成了以知识生产为目标的知识经济形态。相较于手工生产、机器生产而言，人们更容易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进化成主要依靠信息与知识进行脑力劳动的“智力人”，因此更多人开始从事以丰富的行业知识投入为主的职业。能否主动创造知识，创造知识的优先性如何，以及创造出的知识产品的价值大小等智力条件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关键要素。得益于代际间的经验传递与知识积累，后代人理论上总是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代人更聪明，显得更“智慧”，这也是为什么信息时代人的活动能力表现出突出的“智力人”特征。所谓“智力人”，是指主要依靠智力要素投入劳动的人，这个群体的出现和壮大以信息技术对知识的需求为驱动力。

信息革命总体上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提高了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将知识要素的地位推向历史新高。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人们获取知识的能力和机会不对等，而知识精英或技术精英趋向于建立高度集中的知识“帝国”，尽可能地垄断知识生产权，使不掌握知识或技术特权的人实际上处在一种广泛且隐蔽的信息与知识剥削中。这种“剥削”给被剥削群体主动寻求知识增长以进化成“有创造性的人”造成了阻碍^[12]。

总而言之，信息革命既为知识传播与智力提升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也凸显了资本对知识生产领域的侵蚀，促使人类思考如何在技术化生存中守护并发挥人的创造性优势，避免被新的技术形态排挤出去。

（四）智能革命：智能替代与“创造人”的潜能释放

在信息革命基础上，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融合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影响深远的智能革命。其核心是以智能机器取代传统机器，以智能机器大生产取代传统机器大生产。从当前发展阶段来看，特定专用领域的人工智能拥有超越人类的识别、计算、记忆能力，以及知识调度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不仅能大规模替代人的体力劳动，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替代常规性的脑力劳动。从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看，其与之前技术形态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工智能对人体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器官（人脑）的模仿或投影，将工具、动力和智力三种要素整合起来，实现了脑力劳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9]。例如，自动驾驶、智能工厂、机器翻译、智能医疗诊断等技术应用，可以部分甚至完全取代该领域内专业的人类劳动者。

当然，这种智能替代总体上不可逆转，为人的解放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智能生产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使人们拥有更多自由时间，这意味着人们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从事阅读、科学探索、艺术创作、社会公益等创造性活动，推动从“智力人”向“创造人”演进。这种“创造人”包含两重内涵：一是运用最新科技成果，以创造性劳动为手段，二是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目标而自由全面发展的人^[13]。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给人们带来全方位的替代竞争挑战，资本逻辑与算法理性的合谋催生新型智能异化，人的主体性丧失、结构性失业、新型贫困等问题凸显^[14]。

总之，智能革命的本质在于通过对人类思维能力的深度介入，重新定义“人的价值”。人的创造性、情感性与主体性成为区别于智能机器的核心特质，这也为智能时代人的解放提供了全新框架。

二、逻辑解构：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四维向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机器应用的社会条件，指出正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工

人要服从机器”^[15] (P473)，人的“神经系统受损”等一系列负面效应。最终，机器作为“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15] (P469)。由于人工智能与机器具有相似功能和工作机制，人工智能促使资本主义使用形成“智能资本化”或“资本智能化”，成为更隐秘地剥夺人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新工具，这表明资本从利用机器来抑制人的肢体力量进一步升级为利用人工智能来吮吸人的精神能量，导致更深层的无形异化^[16]。

因此，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逻辑展开源于对技术应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批判，要克服智能异化对现实的个人的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和个性解放的挑战。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打破了人们活动的时空界限，人们不仅要着眼于“当下”的发展，而且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人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人的解放目标之一。

在“技术-社会-人”的复杂互动系统中，人的解放过程也是系统作用的结果，各个维度的解放在系统中的定位不同，但互相协同构成人的解放的网状坐标系。其中，劳动解放奠定物质基础，社会关系解放构建外在条件，个性解放确证内在本质，而人的可持续发展则保障历时性目标，四者辩证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指向。

（一）劳动解放：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也是人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因此，在任何时代，劳动都是必要的，劳动解放并不是无需劳动、消灭劳动，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所导致的劳动异化的克服。智能时代的劳动解放是指人们从危险、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转向从事更符合人的本质的创造性劳动；同时也从强制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从事自由劳动的权利，使劳动从谋生手段转化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虽然劳动解放并非人的解放的全部内涵，但始终是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与核心环节。

首先，智能机器的运用显著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在人机协同模式中人们能以较少的劳动生产出较多的产品，驱动创新性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智能机器的应用最为直接的作用就是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个体拥有更多自由时间，从而有条件从事自由自觉的智能劳动^[14]。随着自由时间的延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也进一步被释放。这既是人们对自由劳动本质的回归，是人的劳动解放的应有之义，也是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第一重意蕴。

其次，人工智能在一些高危、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或需要大量体力投入的工作场景中有着良好的应用，因此得以将工人从繁重、危险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改善劳动环境与工人生活。在被资本雇佣而出卖体力的劳动过程中，劳动的同质性明显，部分工人为了获得更高报酬不得不主动延长劳动时间，导致工人内部形成恶性竞争；而人工智能细化了围绕智能生产的分工模式，工人之间的合作性超过竞争性，新的产业结构下的分工形式给工人之间的合作共赢创造了条件。人工智能通过重塑分工、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工人之间“以合作替代竞争”的劳动关系变革，这是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又一重意蕴。

需明确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现代社会异化劳动的根源。因此，处在资本主义应用逻辑中的人工智能带来的仅是有限度的劳动解放，机器取代人并不是实现劳动解放的简单形式^[17]。因此，需从多维度视角探析智能时代的劳动解放，而消解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现实困境的前提是突破资本对技术的垄断^[18]。

（二）社会关系解放：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外在条件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 (P135) 这表明人在劳动性之外的另一重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所有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

和社会交往中。社会关系的解放，即“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0] (P46)}，其本质是扬弃异化的社会关系，建立符合人的本质的交往形式。智能时代的社会关系解放是劳动解放的实现场域，意味着在生产力进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趋向和谐与自由。

在生产关系层面，智能技术打破了传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经济环节互相分离的状态，不仅生产和消费可以融合，分配和交换形式也更加多样^[21]。这一辩证关系在数字经济中得以具象化，例如，个体作为消费者在开展网络购物、信息检索等活动时，同时也在无偿“生产”着数据，这些数据在此后的生产和交换环节将被商家所参考和使用。因此，可以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22] (P691)}。此外，作为生产和消费中间环节的分配和交换也在经历深刻变革。具体体现在虚拟交换方式的兴起，打破了现实空间的物质交换在思想与时空上的限制，使得人们的交换活动更加自由与精准。这种经济活动的变革为克服“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的矛盾提供了新可能，推动生产关系向更趋共享性的方向调整。

在交往关系层面，智能技术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突破了社会交往的时空限制。在传统现实交往的基础上，智能技术衍生出了广阔的虚拟交往空间（如社交媒体、元宇宙），人们的交往形式更加自由，交往内容更加丰富。此外，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大数据、5G等技术相结合，形成以技术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信用体系，从而突破传统“熟人社会”信用体系的圈层限制，推动交往关系从“工具性依赖”转向“主体性互动”，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交往形态提供了实践雏形。

（三）个性解放：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个性解放的内涵是个体的人性或人的本性得到解放，换句话说，也就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0] (P185)}，体现为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凸显。人的个性寓于社会性之中，在强调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独属于每个个体的个性上的差异。人的个性差异既源于生命体生产出来的自然性，也源于人在具体实践中所具备的创造性。

在智能时代，智能生产带来了物质资料的丰富，个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充分保障。在此基础上，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才有可能。首先，人们可基于兴趣自主选择活动与职业，实现更多元的自由选择。其次，以交互性机器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拓展了人的想象力空间，更新了人的思维方式。在与DeepSeek、ChatGPT等大模型机器“对话”的过程中，人们更会意识到人不同于机器的独特性所在，在交互反思中强化人的主体意识。最后，智能机器大规模替代就业带给人的现实困境倒逼人们重新思考个人的“有用性”，进而增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尽管人工智能在感知、计算、记忆、推理等领域具有“过人之处”，但人类得天独厚的情感、意识与创造性却是再高级的算法也无法轻易模拟的。

事实上，在人工智能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这种“人造智能”的恐慌或忧虑实际上也在提醒着人们不断完成自我“进化”，在与智能技术的互动中更自觉地守护个性差异，以人的多样个性来抵抗强大但单一的机器智能的威胁^[23]，这正是智能时代个性解放的关键命题。

（四）人的可持续发展：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长期目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过程”，而非静止状态。因此，人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维度。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指个体具有持续性的学习与适应能力以满足不同时期发展的需要^[24]。在人的动态解放进程中，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与个性解放构成人的解放横向空间维度的目标体系，而人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人的解放在纵向时间维度的目标要素，二者共同保障解放的连续性与完整性。

智能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决定了人工智能的社会功能与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存在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人的部分体力和初级智力的替代，刺激人们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以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只有这样才不会被越来越智能的机器甩入“无用阶级”的行列。因此，智能时代的教育不再是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任务，而是贯穿终身的生存必需。另一方面，智能技术为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条件。目前，智能学习工具与在线教育平台的普及打破了教育资源的地域与阶层壁垒，使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学习机会成为可能。这种技术赋能推动人的发展从“少数人的特权”向“多数人的权利”转变，为实现以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总之，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智能时代实现人的连续性、完整性发展的核心理念。它既区别于工业文明时期发展观中“学习—工作—退休”的线性断裂模式，也超越了抽象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框架，更聚焦于智能时代个体如何实现能力迭代、人机协同与主体价值坚守之间的动态平衡。

三、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实践路径

基于前文分析，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实践应围绕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个性解放与人的可持续发展展开，其宗旨就是要以制度变革规范技术的应用逻辑，以技术创新服务人的发展需求，在破解智能异化的风险中，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解绑”：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实践路径

劳动解放的核心是克服智能技术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劳动异化，推动劳动形态向创造性、自主性转型，将人从危难险重的劳动与不合理竞争的劳动关系中“解绑”出来。具体而言，需从主体能力提升、劳动方式优化与劳动关系调节三方面发力。

第一，劳动主体的解放路径包含劳动意识重塑与能力提升两方面。一方面，要推动劳动意识的持续更新。在智能时代，人们应认识到劳动不仅包括产品生产，也包括知识、数据的创造；不仅有实体劳动，还有虚拟劳动、数字劳动；不仅有常规性劳动，还有创造性劳动；休闲与消费亦可能转化为新型劳动形式，等等。另一方面，需构建人机协同的技能培训体系以提升劳动能力。通过革新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依托在线教育平台整合资源等方式，为劳动者提供与时俱进的智能工具运用能力与创新思维训练，帮助劳动者掌握超越智能机器且有别于其他人的劳动技能，从过去的体力、智力领地踏入综合运用“知、情、意”的智慧领地^[25]。

第二，在劳动方式解放上，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劳动形态从常规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过渡。在制度设计上，需聚焦“常规性劳动替代”与“创造性劳动培育”的平衡。其一，要鼓励那些对于常规性劳动替代有特殊贡献的人工智能优先发展。例如，针对“脏”“累”“险”“害”等不适宜人类完成的劳动，可由政府采取设立专项基金、税收补贴等经济手段鼓励研发替代性智能设备。其二，要通过制度协调人工智能替代劳动的节奏与劳动者转岗的步伐。例如，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推广“人机协作岗位清单”，通过重构分工降低人类劳动强度，并积极开发人机跨界合智的新劳动模式。

第三，在劳动关系的解放上，促进劳动者之间从竞争性劳动关系向合作性劳动关系的转化。在机器体系发展到自动化阶段，人们对机器的使用和操作越来越简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人们之间劳动能力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小^[26]。针对智能时代劳动同质化可能加剧的竞争关系，要培育劳动者的异质性劳动能力，促成劳动者之间、人机之间协同合作；引导人类劳动者逐渐从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中退出，转而从事更具独立性与创造性的管理、服务与控制工作。具体举措包括由行业协会制定协同劳动指南，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平台企业对零工劳动者的管理，将数字劳动者纳入

算法优化的协商机制，避免资本通过算法强化劳动控制，推动劳动关系从“零和竞争”转向“合作共赢”。

（二）“破圈”：智能时代人的社会关系解放的实践路径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的“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19] (P160) 主要包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与社会交往。因此，智能时代人的社会关系解放的路径主要体现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交往等领域。

第一，倡导从“占有”到“共享”的经济关系变革。这种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应该是多维度的：一是调节收入分配制度。针对智能技术应用可能加剧的贫富分化，可对相关企业征收人工智能税，专项用于补贴技术性失业人群，促进智能技术的再投资。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技术性失业群体提供直接的物质性救助或间接的技能型帮助；同时，推动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共享，让更多的教育、医疗、健康、培训、咨询等资源进入免费流动的领域，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红利。三是引导人们从工业文明时代看重物质“占有”到智能文明时代“共享大于占有”的价值观的转变。以制度化规定作为规制，将企业主动提供共享资源、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等发挥社会效益行为与企业税收、评价指标挂钩，将个人“共享”性经济行为纳入个人评价体系等。

第二，在政治参与层面，需搭建技术赋能的民主实践平台。智能生产与生产力的高度繁荣给共产主义的制度建制创造了物质条件，我们可以大胆预测“资本为世界准备的掘墓人看来不是原来想象的工人阶级，而更可能是人工智能”^[27]。在促进智能时代政治关系变革上应从人工智能与政治制度的双向互动着手。一方面，合理设置相关制度，规范技术运用的限度，将技术“关进权力的笼子里”。此外，要突出技术为人服务的宗旨，确保人类对核心政治过程的主导权，实现技术向善的综合“善智”与“善治”。另一方面，合理利用智能工具的开放性、共享性特征，增加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提升国家智能化治理水平。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开发“民意感知系统”，通过人工智能对数据的良好捕捉、存储与分析计算能力，治理主体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治理需求，为政策制定提供精准依据，从而促进政治关系的稳定性。

第三，推动从传统“圈层”交往向“平行”交往的过渡。在智能时代，人们可以跨越物理和社会的界限，形成更广泛的“平行”社交网络。要顺利实现这种交往形式的过渡，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在技术层面优化算法，建立伦理嵌入的虚拟交往规范^[28]。针对算法可能强化的“信息茧房”与价值偏见，要求在社交平台、内容推荐系统中嵌入有利于多元交往的算法，避免用户被单一圈层固化。二是在社会层面推动跨圈层互动平台建设。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可验证的社会信用体系，记录用户在不同社群的交往行为与信用评价，降低陌生人跨圈层合作的信任成本。三是在个体层面提升认知水平和媒介素养。鼓励用户以多重数字身份参与多元社群，实践“身份实验”以突破现实社会角色限制。

（三）“破茧”：智能时代人的个性解放的实践路径

智能时代个性解放的目标是破除智能技术对人的规训与同质化塑造，守护人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实现个性的“破茧”，具体要从需求性满足、独立性保障与创造性激发三方面推进。

首先，在需求性满足上，需培育多元包容的精神产品市场。具体措施包括：一是针对智能时代可能出现的文化产品同质化问题，对小众艺术、地方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异质性文化产品给予资金支持与传播渠道倾斜；二是对基于算法推荐的平台内容辅之以人工筛选，定期展示多元文化产品，避免用户被“流量逻辑”裹挟，陷入“信息茧房”困境；三是以符合人民立场的文艺观、体育观、新闻观等指导精神产品的生产，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供给精神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文化需求。

其次，在独立性保障上，需构建“全链条”的隐私保护机制。针对智能技术对个人数据的过

度采集与不合理利用，对人工智能伦理的治理应该多管齐下。一定程度上，智能时代的人们要改变自己对于隐私的认知，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技术的设计中嵌入防范隐私泄露的算法，明确企业采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边界，并加强对人工智能相关从业者和网络科技公司的监管，对违规行为设定明确的处罚标准，通过智能社会的代码化规则与法律规范守护人的独立性。

最后，在创造性激发上，需发展劳动与休闲融合的实践形态。休闲是人们实现主体性解放与生命意义建构的重要实践场域，在智能时代，鼓励发展“休闲劳动”既是对人的创造性的激发，也是应对闲暇时间增多后社会失序的必要之举^[29]。因此，要推动数字休闲基础设施的公有化改革、培育非商品化休闲共同体、重建劳动与休闲的伦理边界、构建反消费主义的休闲意识形态，发展以“休闲劳动”为主的休闲业^[30]。例如：北欧国家通过立法实行劳动者灵活工时与休假制度改革，中国可借鉴这一国际经验完善和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为休闲劳动提供制度保障；澳大利亚“打工度假计划”（Working Holiday Maker Program）允许年轻人通过短期工作支持旅行，促进跨文化体验与休闲劳动结合。这一制度变革的本质就是要突破传统劳动与休闲的物理边界，打破资本对自由时间的垄断性剥削，使马克思所设想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0]（P537）}的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展开。

（四）“赋能”：智能时代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

智能时代人的可持续发展，其本质是在高科技语境下捍卫与发展人之为主体的主体性、完整性与未来性。对此，需以终身教育制度培育持续学习能力，以健康生活理念平衡多组关系，以人工智能发展长效规约推动构建人机协同秩序。

第一，推广终身教育制度，促进人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终身教育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社会为个体提供终身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是指个体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从教育理念看，要主张自主学习和快乐学习态度，培育可持续学习能力；从教育内容看，终身教育应涵盖德、智、体、美、劳全面教育；从教育形式看，跨界数字化学习应成为未来学习的主流形式。

第二，倡导健康生活理念，促进人的生活方式可持续。在智能时代，健康生活应实现三组关系的平衡：身体与心灵的平衡、劳动与休闲的平衡、“线上”与“线下”的平衡。首先，除了对身体健康的高度预警和及时干预之外，也要关注心理健康，以“慢生活”对抗智能时代“加速社会”对人心理的侵扰。其次，培育文明休闲观和休闲文化，通过自主阅读、公益服务、文艺创作等休闲活动增强自己在智能社会的参与感和对自身的掌控感。最后，明确线上与线下空间的界限和线上时间在健康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防止“虚拟沉溺”，做到线上赋能线下而非替代。

第三，建立人工智能长效发展规约，促进人机互动可持续。技术是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外部因素，我们应学会与机器长期和谐相处，并通过与智能机器的友好互动“赋能”人的可持续发展。具体举措包括制定全球通用的人工智能技术标准，规范智能技术的设计开发；加强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与法律建设，明确人工智能的主体责任与伦理道德地位；优化智能社会的顶层设计，在科教文卫与社会保障等领域开展制度改革，最终建构人机协同、人机和谐、优势互补、共同提升的新型人机关系。

四、结 语

科技革命与人的活动能力演进始终存在深刻的历史关联。伴随近代四次科技革命，人的活动能力呈现出从“体力人”到“机械人”“电力人”“智力人”和“创造人”的跃迁。当然，这个转变过程并不是自发的，尤其是当下智能时代要实现从“智力人”向“创造人”的转换，需化解资

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解放”与“异化”双重性之间的深层矛盾，从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个性解放与人的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广泛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处于发展的热潮当中。作为一项建立在强化学习基础上并试图模拟人脑思维模式的综合性技术，人工智能表现出某些“类人”性甚至“超人”性，正在成为可以使人类智慧具象化的“智能器官”^[31]。未来若在鲁棒性、可解释性和交互性上取得突破，人工智能将走向更加强大的阶段。然而，无论智能技术如何进步，我们都要始终坚守“人是目的”的价值立场，驾驭技术而非臣服于技术，从技术的“座架”中解放出来^[32]。

就本质而言，智能时代人的解放不仅是对科技革命与人的活动能力演进历史逻辑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当代拓展。解放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控制机器”，而在于通过社会变革打破资本对技术的垄断性支配，推动技术发展的民主化转向，使其成为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促进社会协作、丰富人类个性、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杠杆。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2] 闫坤如.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及其本质探源[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 [3] 涂良川. 《资本论》机器观视域中的人工智能[J]. 理论探讨, 2022(2).
- [4] 林剑. 论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的劳动解放与社会解放的意义[J]. 人文杂志, 2019(11).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 [6] 蓝江. 智能算法下人的数字化异化与生存变革[J]. 人民论坛, 2021(Z1).
- [7] 龚振黔. 当代科技革命与人的活动演变问题研究[M].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3.
- [8] 贾璐萌, 赵佳欢. 超越与复归: 人机协作的历史演进及其双重逻辑[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
- [9] 黄欣荣. 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J]. 理论探索, 2018(5).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 [12] 徐昕. 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批判[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
- [13] 张昊雷. 从“消费人”到“创造人”: 科技革命背景下人类发展模式的演进[J]. 理论月刊, 2018(1).
- [14] 蔺庆春. 人工智能与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行路径——兼论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及其内在生产逻辑[J]. 科学社会主义, 2021(5).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肖峰. 《资本论》的机器观对理解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重启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6).
- [17] 刘伟兵. 人工智能会实现劳动解放吗?[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2).
- [18] 张自永, 吴宏洛.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四维解析[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6).
-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21]徐浩然,王远才.数字平台的系统性及其对社会化生产过程的影响分析[J].数字化转型,2025(2).
- [2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3]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0(12).
- [24]陈艳华.论人的可持续发展[J].东岳论丛,2005(2).
- [25]黄欣荣,张魏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解放[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26]何海燕.究竟什么是劳动解放?——异化史观的逻辑缺陷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启示[J].现代哲学,2021(5).
- [27]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J].哲学动态,2018(4).
- [28]王阁.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的新型交往形式及其影响探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3(2).
- [29]于萍,马湘芊.马克思生态休闲思想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
- [30]魏郡.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休闲困境”:资本逻辑与主体疏离的双重张力[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
- [31]涂良川.人工智能时代的唯物史观基本问题探究[J].中国社会科学,2025(2).
- [32][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Logical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Human Emancip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WEI Li

Abstract: All previou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 modern times have advanced the process of human emancipation by innovating production tools, and this logic continues to deepe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AI drives the evolution of human activity capabilities from the “intellectual human” (with intelligence as the dominant form) to the “creative human” (with creativity as the core form).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emancipation, human emancip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encompasses four dimensions: emancipation of labor, of social relations, of individuality, and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provide diverse practical paths for human emancipation by shortening the social necessary labor time, expanding the space for social interaction, stimulating individual creativity, and enabling lifelong learning. In essence, it is necessary to eliminate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logic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by coordinating innov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realiz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free labor, equal relations, prominent individ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overcoming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Key words: intelligent era; human emancip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apital logic;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孙洁)